

从红安革命歌谣看妇女意识的觉醒

杨杨

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 红安革命歌谣是在火热的年代产生的, 它真实的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的岁月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过程, 是党进行革命宣传和进行统战的有力工具, 同时也是妇女在革命斗争中表达自我、争取权益的重要载体。本文通过寻绎红安革命歌谣中所描述的妇女形象探析革命洪流中的妇女意识是如何觉醒的, 进而揭示妇女意识的丰富内涵, 认为妇女意识意识的觉醒是推动妇女解放的先导。

关键词: 红安革命歌谣; 妇女解放思想; 妇女意识

DOI: 10.64216/3080-1494.25.05.028

妇女意识的觉醒是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先导, 随着中国革命的推进与发展,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断推进。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与发展的红革命歌谣, 有不少反映女性意识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内容。生动鲜明、贴近生活、朗朗上口的歌谣作为基层妇女日常娱乐和表达情感的艺术形式, 是最容易为她们所接受的, 通过将妇女参加革命、翻身解放等革命话语置于妇女歌谣中, 可以使妇女在演唱革命歌谣时逐渐认识、了解和消化这些形象, 进而将这些形象与自身联系起来, 完成向革命歌谣所描绘之妇女形象的转变。跨过历史的洪流, 从红安革命歌谣展现的妇女形象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女性意识的觉醒与萌芽。

1 妇女解放思想的缘起

1.1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

“frailty, the name is woman!” “脆弱啊, 你的名字是女人! 女人啊, 你的名字是弱者!” 然而女性并非是天生的弱者。

关于妇女解放, 最早可以追溯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 在他的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明确的指出, “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 后来恩格斯进一步将这句话总结为: “在任何社会中,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其中, 妇女解放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们从探究婚姻制度, 批判妇女受压迫的制度根源中探索争取妇女权益的方式。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家庭关系的虚伪面目,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面对资产阶级的污蔑, 马克思、恩格斯再次

进行了正面回应, 并且严厉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对妇女的残忍剥削。他们指出: “资产者是把他的妻子看做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 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们想也没有想到, 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成熟时期, 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根本性的制度桎梏中对妇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压迫现状的深刻阐释, 充分显示出其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和对妇女解放事业的重视。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文中分析了16世纪初德国主要的社会阶级状况。他在描述德国农民的悲惨处境时指出, 农民阶级是处在除平民反对派以外所有阶级之下的, 是在整个民族中遭受剥削的群体, 而广大的农村妇女更是遭受着更为深重的压迫和剥削, 因为“主人像支配财产一样任意支配农民及其妻女的人身”。

另一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在推动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 始终关注妇女和儿童权益保障问题。他们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儿童遭受的严重剥削, 将维护弱势群体权益作为重要斗争方向。恩格斯在《资本论》书评中高度肯定英国工人争取妇女童工十小时工作制的斗争成果, 强调这是通过长期抗争、利用政治权利和阶级矛盾取得的胜利。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提出劳动保护原则, 主张在危害妇女健康或违背道德的劳动领域禁止使用女工, 强调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必须以确保身体健康为前提。

恩格斯系统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继承发展了傅立叶的思想精髓, 指出资本主义两性关系的本质性缺陷, 创造性提出“妇女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这一核

心论断。在恩格斯的晚年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又对妇女问题进行了系统化理论建构，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成熟发展。该书在1884年首版序言中创造性提出“两种形式的生产”，揭示妇女在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既要参与物质生产（创造生活资料及劳动工具），又承担人类自身再生产（实现种族延续）。这一理论突破不仅科学论证了妇女对人类文明存续与进步的双重贡献，更从根本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评价妇女社会地位的核心标准——既肯定其物质生产者的经济价值，也承认其人口再生产者的社会价值。恩格斯对妇女社会功能的双重定位，为国际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压迫提供了理论基石。列宁也说：“只有在大规模地开始为消除这种琐碎家务而斗争（在掌握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更确切地说，大规模地开始把琐碎家务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地方和时候，才会开始有真正的妇女解放，真正的共产主义。”

毛泽东批判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大革命时期指出，中国妇女解放的核心障碍是腐朽的封建压迫而非资产阶级剥削，这一特征在城乡差异中尤为显著。红安农村妇女深受缠足陋习摧残，丧失劳动能力与经济独立性，被禁锢于父权与家庭。中国革命虽非主动推动妇女解放，却间接促进了妇女意识觉醒。尽管当时革命歌谣的创作与传唱运动主要是要发动群众基础以动员革命，但其思潮萌芽已展现出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特殊性——封建枷锁的破除与革命紧密交织。中国的妇女解放思想与中国的革命息息相关，可以说二者是同时进行的，中国革命是女性解放的终极推手。而革命歌谣作为历史的产物，无疑是探索妇女意识的较好载体。

2 红安革命歌谣中的妇女形象

2.1 备受压迫、社会地位低下的妇女形象揭露

革命歌谣是在革命政党干预下对传统歌谣进行政治化改编的历史的产物，具有对民众的思想、身体以及行为进行形塑的功能。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揭露出中国传统社会中妇女所受压迫的四重根源——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这四种权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1]然而长期生活于这种环境的传统妇女并不会自然产生其深受压迫，要站起来反抗的意识，因此只有通过特定的渠道——革命歌谣，向妇女灌输其受

压迫和社会地位低下的形象意识，方能激发她们潜在的革命动力。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妇女并不能享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社会地位极为低下，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妇女的这种境遇已经演变为风俗。然而在革命浪潮的席卷下，妇女群体也被卷入革命运动之中。妇女作为红安的重要群体，是中共领导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她们长期生活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具有潜在的革命性，因此动员妇女参加革命成为必然。中共在红安发动革命之际，力图通过对传统歌谣进行革命化改编，将妇女的社会地位和被压迫的境遇揭露出来，使妇女充分意识到不平等的现实，进而觉醒其女性意识、激发革命斗志。如革命歌谣中有一首《妇女解放歌》，描绘了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生活困苦的形象：“旧礼教捆我身，妇女哪知情，谁知道你痛苦，是从何处生，旧礼教上真正捆死人，叫声各妇女，穷苦姐妹们，实不落在陷人坑。又穿耳又缠足，实在真可恨，搽水粉点胭脂，失掉人的形，把人当作一个妖怪精，叫声各妇女，穷苦姐妹们，好像混世虫儿过一生……”^[2]

这首歌谣描述了传统妇女在旧礼教规训下没有人身自由，他们必须按照礼教履行穿耳和缠足的习俗，女子在自己的婚姻上没有发言权，成为包办买卖婚姻的牺牲品，更无男女平等可言，作为寡妇甚至被当作牲畜一般进行买卖。这些歌谣深刻描绘出社会底层妇女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任人摆布、痛苦生活的悲惨形象。

当然传统社会中妇女也有贫富之分，旧礼教真正约束和迫害的是贫家妇女，而富家女子则享受着优厚的生活待遇，这种贫富差距在农村中农民妇女与富家女子之间对比尤为明显。有一首《农民妇女们》将农民妇女与地主妇女的生活状况做了鲜明对比：“农民妇女们，都是可怜人，想起过去不平等，实在好伤心。地主妇女们，天天睡早晨，睡到午时下门庭，打扮出房门。农民妇女们，天天起五更，饭做熟了天未明，下畝把田耕。地主妇女们，出门一身新，擦脂抹粉多娇嫩，象个活妖精。农民妇女们，自叹自苦情，观灯看戏我无份，活路忙不赢。地主妇女们，生活好得很，一日三餐不断荤，一辈子不操心。农民妇女们，都是穷苦人，缺油少盐吃两顿，儿女闹缠人。地主妇女们，鬼话多得很，她说她是天生成，八字命注定。”^[3]

该歌谣将农民妇女的辛劳、穷苦与地主妇女的安逸、奢侈进行对比，凸显底层妇女生活水平的低下和内心的

痛苦，她们想要参与革命，改变自身命运的愿望更为强烈。

2.2 拥护红军的妇女形象塑造

革命时期，在进行军事战斗过程中，必须以大量军事物质作为后勤保障方能取得胜利。在红安革命根据地，物质极为匮乏的情形下，通过歌谣发动拥军运动，动员民众积极为红军提供军事后勤物质，是军事物质的重要来源。妇女在传统上是农村生活物质的主要生产者，她们心灵手巧，擅长用传统工艺做鞋、袜、衣服和被子等生活用品，充分调动她们拥护红军的积极性，为红军提供各种生活物质资料以及力所能及的后勤保障，能够极大提高红军的战斗力。革命歌谣通过塑造妇女送郎参军的形象作为铺垫，将妇女与红军战士的命运紧密相连，在此基础上再塑造妇女拥护红军的形象则为理所当然。红军第四军教导第一团曾编了一首《拥护红军歌》，歌词如下：“姐妹们齐来听，革命男女要平等；噹噹噹！封建要肃清，哎哟！目前革命突猛进，多亏红军作斗争，噹噹噹！解放我穷人，哎哟！前天红军得了胜，听说游击到麻城，噹噹噹！我们要欢迎，哎哟！瓜子花生用砂炒，做的鞋袜要做好，噹噹噹！拥护我同胞，哎哟！大家队伍要站好，放开大步往前跑，噹噹噹！切莫迟到了，哎哟！见了同志莫吵闹，慰劳物品亲手交。噹噹噹！同志莫嫌少，哎哟！同志暂且休息定，洗浆缝补我应承。噹噹噹！更衣讲卫生，哎哟！歇歇脚腿洗洗脸，磨磨刺刀擦枪杆。噹噹噹！消灭“包围”战，哎哟！同志冲锋向前干，我们劳动齐生产。噹噹噹！保卫鄂豫皖，哎哟！”^[4]这首《拥护红军歌》描绘了妇女拥护红军的两种主要方式：一是为红军提供食物、生活用品等物质援助以慰劳红军，比如瓜子、花生、鞋袜等；二是为红军洗衣缝补，改善红军的生活卫生条件。这两种方式紧密契合农村妇女的劳动特点，使她们在日常劳作的空隙中能够完成拥护红军的任务。红安革命歌谣通过塑造妇女拥护红军的形象，旨在引导妇女在实践中做出利于壮大红军队伍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行为和取向。

2.3 妇女参加革命、翻身解放的新形象

动员人民参加革命是革命歌谣宣传和动员的主要目的，在以妇女为主题的革命歌谣中，其歌词的叙事逻辑首第一是描述传统妇女受压迫和不平等的现状，第二层逻辑是号召她们参加革命改变这种现状。因而在塑造

出妇女受压迫、社会地位低下、不平等的形象之后，紧跟着就是妇女起来参加革命的形象。比如一首《妇女解放歌》在描述妇女悲惨境遇后，在最后两段直接指明了歌谣的主旨：“好了好了真好了，革命高潮几来到，姊妹们参加地暴。大家姊妹向前进，打破黑暗见天明，全世界男女平等。”^[5]另一首《妇女歌》最后唱到：“团结起来作斗争——努力奋斗不怕牺牲，才有出路。游击战争来开展——革命前途是共产，快来参加。反动势力都肃清——一起来把土地分，吓死敌人。”^[6]这类歌谣塑造了基层妇女团结一致，不怕牺牲，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参加革命斗争的形象，对革命地区基层妇女具有较强的号召力。

妇女革命歌谣的第三层逻辑即为妇女参加革命后获得翻身解放的形象，这种形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从旧礼教中解放出来，摆脱包办婚姻，实现婚姻自主，正如一首《妇女调》唱到：“大家快快要觉醒，赶快参加闹革命。铲除一切买卖式，取消一切包办婚。铲除封建旧礼教，打倒豪绅不留情。”^[7]第二是从闺门中走出来，摆脱压迫，参加生产，实现经济独立，比如《蝴蝶调》中唱到：“肃清封建世，割断捆人绳，无论什么不靠那别人，姊妹来参加，百事我也有分，莫把脚来缠，参加来生产，犁天打耙一切我来干，不靠那别人，免受男子妻片（笔者注：欺骗）。”第三是获取政治权利，实现男女平等，参加红军，共同参与建立和管理苏维埃政权，比如一首《妇女歌》唱到：“苏维埃政府来建起——管理政权不分男女，彻底解放。”《蝴蝶调》唱到：“姊妹要努力，参加守兵队，站岗放哨自己我也气（去），帮助他出发，才把政权夺起。”^[8]可见革命歌谣描绘的妇女翻身解放形象中，不仅关乎妇女意识觉醒，从旧传统秩序的约束中解脱出来，而且将妇女的命运与苏维埃政权紧密联系起来，将妇女解放引入政治化的道路，以新政权的建立推动红安妇女翻身解放，以翻身解放后的妇女巩固新政权，进而实现妇女解放与苏维埃政权发展的良性互动。

3 歌谣对妇女意识觉醒的推动

3.1 妇女自由观念的觉醒

妇女受苦歌，通过揭示封建压迫，唤醒妇女的自我意识。妇女在传统社会属于弱势群体，上文已经指出，她们遭受着政权、神权、父权和夫权四重压迫，社会地位低下，人身自由受到严重束缚，具有潜在的革命性，

但对于长期生活在封建束缚环境下的妇女来说，他们适应了既有的社会公序，因此这一调动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

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上认识到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后，在歌谣中用通俗的话语将这种压迫根源表述出来，让妇女们在演唱歌谣时能够明晰意识到自己受压迫的境遇及其根源，进而萌发争取自由的观念。这一类歌谣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受苦受难的情况，如一首《妇女歌》，将妇女在婚姻中的不自主地位用激进的阶级言语鲜明地表现出来，以冲击她们逆来顺受的传统观念，倡导新型婚姻制度，激发她们的革命意识。

歌谣作为传统妇女习惯用来表达情感的民间文艺形式，将其革命化改编后成为向妇女灌输自由和解放观念的有效渠道，有益于推动妇女人身自由观念觉醒。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所编《新葡萄仙子》中唱到：“我本是一女人，数千年痛苦都受尽。深居闺阁好似犯罪人，经济无权、教育无份到如今，还有吃人旧礼教，一切自由剥夺尽。斩断礼教束缚，打碎封建枷锁，若不这样永远做奴隶！”^[9]这句歌词对妇女的际遇进行了深刻而形象的分析，容易深入到妇女的心理，激发她们获得人身自由的欲望和动力。除此之外《童养媳》《妇女解放歌》《农村妇女们》革命歌谣通过生动形象的歌词和凄凉悠长的曲调，将妇女生活上的痛苦表达得淋漓尽致，唤起了妇女对自身处境的深刻反思和对封建压迫的强烈不满，进而唤醒了妇女的自我意识，她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力量，不再甘于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而是积极投身革命斗争，争取自身的解放和权益。

3.2 妇女革命意识的觉醒

妇女革命歌，激发革命斗志。妇女革命歌，通过描绘妇女参加革命，获得自身解放和自由的形象，表达出妇女翻身的喜悦，从而激发妇女参加革命的斗志歌谣中许多歌词形象描述了传统妇女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经济和受教育的自由，在旧礼教的约束下一切自由都被剥夺的境遇。这种启蒙方式将过去的妇女在不平等的伦理秩序下的逆来顺受，与革命妇女为了争取平等而踊跃革命的态度进行对比，让广大劳动妇女充分认识到参加革命，争取自身解放必要性。她们在歌谣的鼓舞下，勇敢地走上战场或投身后方建设，为革命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同时，歌谣中的革命道理和革命理想也坚定了她们信仰和追求。

妇女革命歌反映了红安妇女获得人身自由后的喜悦与自豪，如《妇女革命歌》：

八月里来是中秋，女子放脚又剪手，不受摧残与束缚，文明世界争自由，

九月里来是重阳，婚姻包办不应当。消灭姨太寄生虫，纠正游荡女流氓。

十月里来小阳春，男女各尽各所能。都为苏维埃政权而战，争取解放得翻身。

冬月里来正立冬，国民革命送了终。消灭军阀的混战，豪绅地主不能容。

腊月里来是一年，劳动妇女百万千。只要觉悟团结好，平等自由在眼前。

歌谣唱出了妇女翻身做主人的豪情壮志，展现了她们在革命斗争中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精神。

3.3 男女平等意识的觉醒

妇女解放歌，通过描述妇女权利缺失，男女不平等的形象，是妇女从中受到启发，从而得到男女平等意识的觉醒。传统社会中，妇女深陷权利缺失与性别压迫的困境，“三从四德”的伦理枷锁将女性固化为依附性社会角色。底层劳动妇女尤为悲惨，既无法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政治、经济、教育权利，更难以突破森严的等级壁垒改变命运。苏区革命歌谣通过大量妇女题材作品深刻揭露了这一社会痼疾：如《解放蝴蝶调》痛斥“男重女轻”的封建观念，

姊妹你莫笑，姊妹你莫闹，

听我唱过解放蝴蝶调，姊妹们仔细听，且听我说个根苗。

男子也是人，女子也是人，

提高男子女子你看轻，世界不平等，

姊妹们怎能聊生？

穿耳又缠足，百事不能做，

早晨起来仔细把头梳，这样不自由，

姊妹们怎能出头？

受种种欺骗，停止我发言，

政治教育一切我无权。

歌词直指“同为人却不同命”的制度性歧视；《妇女解放歌》以“政治经济无权利，教育法律尽剥夺”的控诉，勾勒出女性完全被排除在社会治理体系之外的生存图景；《妇女读书歌》更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双重压迫——既剥夺女性受教育权制造“无知”困境，又以“独守空房”

的禁锢手段切断其认知世界的通道，形成“男性享有自由迁徙权，而女性却被禁锢于封闭空间”的畸形社会现实。婚姻自由歌则反映妇女对婚姻自主的渴望与追求，如《童养媳歌》等。这些歌批判了封建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的旧俗，倡导建立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新型婚姻制度，为妇女的婚姻自主权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这些歌谣以底层视角，生动刻画了传统性别秩序中制度性压迫与文化规训的共谋关系，从而促进其男女平等意识的觉醒。

4 结论

红安革命歌谣裹挟着革命战争时期红安的岁月风尘，或轰轰烈烈，或低吟浅唱，生动真切的歌词中，可以感受到歌谣背后最沉重的灵魂。红安革命歌谣不仅是歌谣政治化的产物，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它们具有广泛的传播且深入人心的教育作用，通过对妇女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的描写，折射出革命时期妇女的形象，推动了妇女地位的提升和社会观念的转变。它们通过生动的歌词和激昂的曲调唤醒了妇女的自我意识，激发了妇女的革命斗志，推动了社会变革的进程。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红色歌谣中汲取力量汲取智慧，为新时代妇女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 [2]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
-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

版社，2003。

- [4]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 [5]《妇女歌》，皖北革命歌社印，1933年9月5日，罗山县档案馆藏，档号：B3-9-1-9。
- [6]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编：《劝五更》，红安县博物馆藏，引自红安县革命史编写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红安革命歌谣选》。
- [7]《第三课 妇女解放歌》，陈隆普：《革命歌词抄本》，红安县革命博物馆藏，档号：革 36。
- [8]《第二十三课 蝴蝶调》，陈隆普：《革命歌词抄本》，红安县革命博物馆藏，档号：革 36。
- [9]袁仲扬作：《妇女解放》，原载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湖北农民》第十二期，红安县革命史编写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红安革命歌谣选》。
- [10]《农民妇女们》，选自红安县博物馆收藏歌本，红安县革命史编写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红安革命歌谣选》
- [11]郭家齐：《红安革命歌谣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
- [12]《拥护红军歌》，采自中国红军第四军教导第一团油印本“革命文献”，冬池采辑：《大别山老根据地革命诗歌选》。
- [13]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编：《新葡萄仙子》，红安县博物馆藏，引自红安县革命史编写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红安革命歌谣选》。